

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与年代

陈悦新

(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历史文博系, 北京 100083)

摘要: 金塔寺东、西二窟中心柱上的泥塑佛像服饰保存较完整。此文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佛衣、菩萨及天王衣饰, 推定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的年代约在太和(477-499)初期, 其中东窟佛像服饰的年代似较西窟略早。据佛像服饰分期, 姑认为金塔寺东、西二窟的营造年代大体与之相当。

关键词: 金塔寺石窟 佛像服饰 洞窟年代

中图分类号: K879.41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6252(2013)01-0095-08

金塔寺石窟位于张掖市南62公里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的祁连山境内。在临松山西面、大都麻河西岸的红石崖壁上, 距地面约60余米处, 凿有两个规模较大的洞窟, 一般称为东、西二窟。

东窟残深7.65米, 宽9.70米, 高6.05米。窟平面为纵长方形, 覆斗顶, 窟内中部凿中心柱, 因山崖崩塌, 窟室前半部早已损毁, 中心柱几乎裸露于山崖的边沿。窟内壁面不开龕。中心柱四面分三层开龕造像, 下层每面正中各开一个大龕, 龕内各塑一佛, 龕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或弟子; 中层每面并排凿三个浅龕, 龕内各塑一佛, 后面^①三龕外塑千佛, 余三面龕外各塑一胁侍菩萨; 上层除右面为后代补塑外, 余三面均塑十佛、十菩萨。

西窟形制与东窟基本相同, 只是规模较东窟略小, 残深3.90米, 宽7.90米, 高4.30米。窟内中心柱也分三层造像, 下层每面正中各开一个大龕, 龕内各塑一佛, 龕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或着铠甲衣的天王形象; 中层正面主尊后代改塑为藏式祖师像, 左面和后面各塑一佛, 右面主尊为思惟菩萨, 正面主尊两侧各塑四胁侍菩萨, 后面主尊两侧上、下各塑二胁侍菩萨及二弟子, 左右面主尊两侧共七身胁侍菩萨; 上层每面塑千

收稿日期: 2012-10-08

基金项目: 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课题“五至八世纪汉地佛像服饰研究”(2009028-15/08)

作者简介: 陈悦新(1964-), 女, 宁夏银川人。副教授, 主要从事佛教考古与汉唐考古研究。

① 为便于认识造像在中心柱上的布局, 文中中心柱的“后面”指“北面”, “左面”指“东面”, “右面”指“西面”, “正面”指“南面”。

佛或菩萨。^①

中心柱上泥塑佛像服饰保存较完整,为系统排比佛像服饰提供了较好条件。本文拟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佛衣、菩萨及天王衣饰,试讨论佛像服饰的类型与年代及其所反映的洞窟开凿年代问题。

一、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

金塔寺石窟内佛衣、菩萨衣和天王衣一般装饰一种衣纹,这种衣纹以突起的两股曲线合为一股,每股上刻阴线一道或两道,同时在每股之间的凹面上刻阴线一道,其外观轮廓形似叉状或燕尾形或Y字形。^②据两股曲线通过相互勾结、合成一股的逻辑表现形式,拟名为“勾连纹”。金塔寺的勾连纹在交合处两股的内边线闭合,外边线延伸合为一股,同时交合处阴刻短弧线。

佛衣由内而外披覆三层长方形的三衣。里层第一衣安陀会(意译下衣),中层第二衣罽多罗僧(意译中衣),外层第三衣僧伽梨(意译上衣)。根据印度和汉地佛教造像中三衣披覆形式,首先,从层次上将佛衣区分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。上衣外覆类仅表现上衣的披覆形式,中衣外露类则既表现上衣也表现中衣的披覆形式。其次,上衣外覆类据上衣披覆形式可分出通肩式、袒右式、覆肩袒右式、搭肘式、露胸通肩式等五种类型;中衣外露类据上衣及中衣披覆形式可分出上衣搭肘式、上衣重层式、中衣搭肘式等三种类型。^③

金塔寺石窟佛衣以覆肩袒右式和通肩式为主,多装饰勾连纹。覆肩袒右式佛衣指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,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绕过搭左肩的样式(图一:1—2,图版1、2)。通肩式佛衣指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,右衣角绕颈搭左肩的样式(图一:3—5,图版3)。

菩萨衣的分类和称谓较少专门研究。^④为叙述方便,据主尊菩萨与胁侍菩萨衣主要特点,拟名下裙式和袒右式,也多装饰勾连纹。下裙式指上体裸,下身着裙,披巾搭肩顺于体侧的样式(图二:1—4,图版4)。其中,西窟中心柱右面上层思惟菩萨位居中间、形体高大,应为主尊。袒右式指外衣覆左肩,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绕过搭左肩的样式,仅见西窟(图二:5,图版5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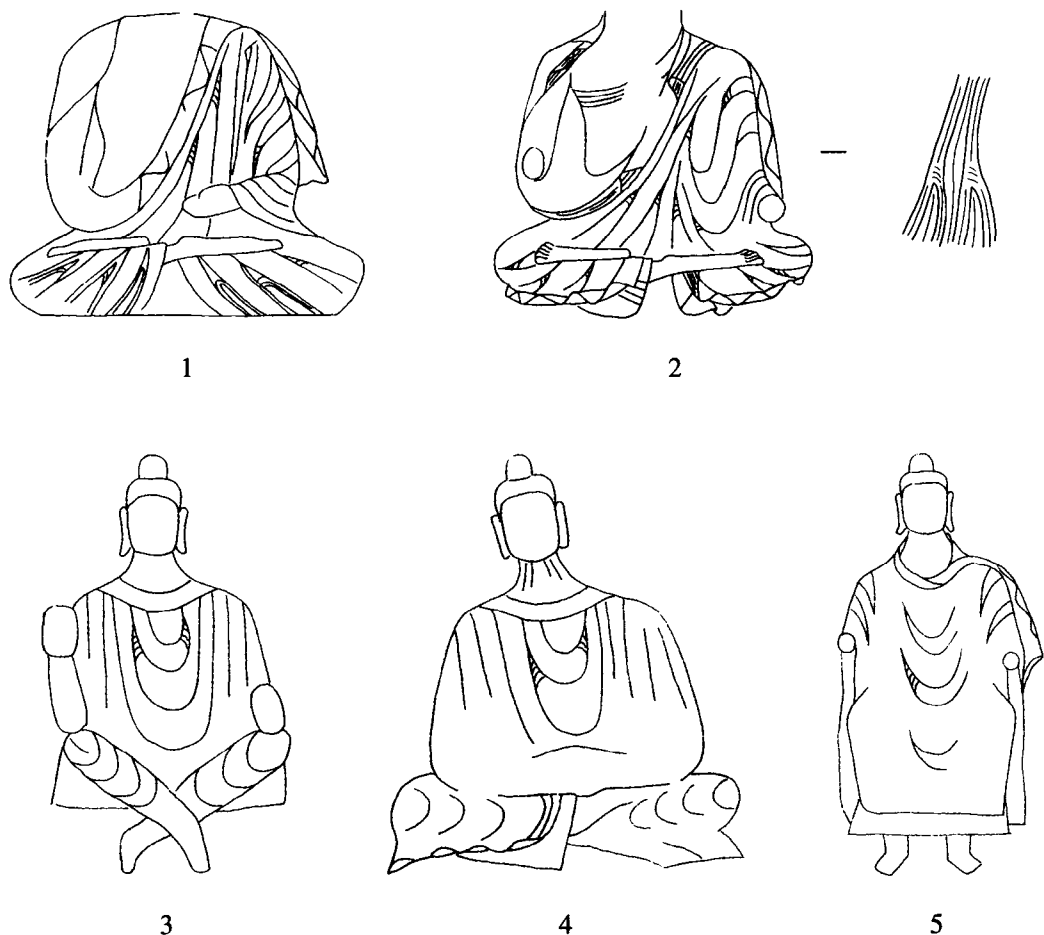
天王着铠甲衣,裙上装饰勾连纹,仅见西窟(图二:6,图版6)。

① 参见姚桂兰、格桑美卓《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内容总录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1995年第2期,第78—79页。

② 如: Benjamin Rowand, Notes on the Dated Statu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, *Art Bulletin*, Vol. XIX, No. 1, 1937, p. 102. 形容为参差不齐的长柄叉状褶痕。金申《易县北魏交脚菩萨像造型上的几个问题》(《文物》1997年第7期,第61页)形容其分叉时呈燕尾状,李玉珉《金塔寺石窟考》(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22卷第2期,2004年,第40页)形容其为Y字形衣褶。

③ 陈悦新《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2期,第48—72页。

④ 吉村怜《古代佛、菩萨像的衣服及其名称》分析了菩萨衣饰的基本组合,但未给出术语称谓。(参见《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·研究卷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6年,第157—172页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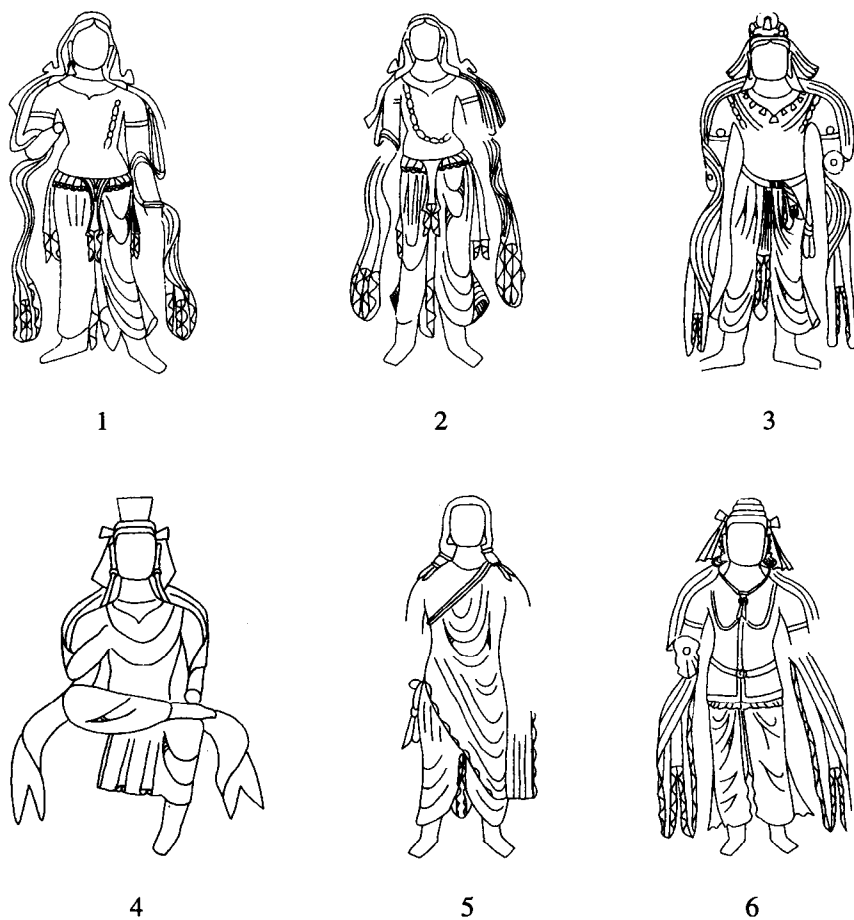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 金塔寺石窟佛衣类型

1. 东窟中心柱正面下层 2. 西窟中心柱右面下层及胸腹局部
3. 东窟中心柱右面中层中龕 4. 东窟中心柱右面中层左龕 5. 西窟中心柱左面中层

二、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的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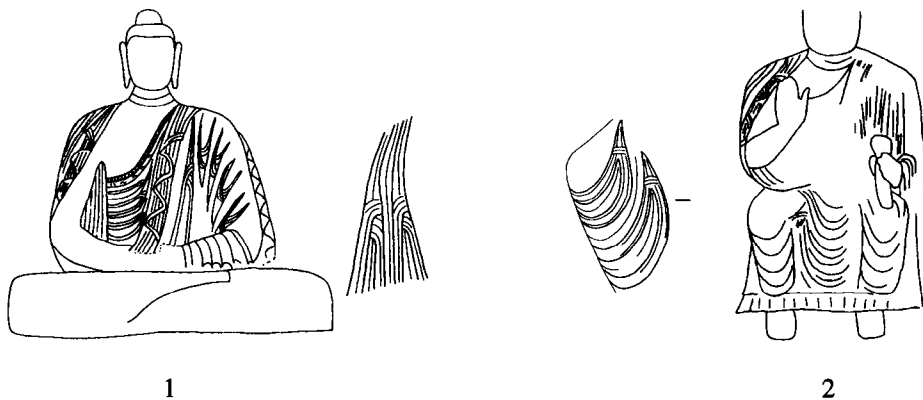
金塔寺覆肩袒右式和通肩式佛衣装饰勾连纹的形式，与云冈石窟“昙曜五窟”中第19、20窟及第7、8窟的佛衣特点相似。云冈第19、20窟覆肩袒右式和通肩式佛衣的勾连纹在交合处内边线相互咬合，每股上的阴线也随形咬合（图三：1），金塔寺勾连纹细节与其有所差异，而与云冈第7窟的勾连纹表现形式接近，第7窟勾连纹在交合处内边线闭合、阴刻短弧线（图三：2）。

云冈石窟佛像服饰勾连纹的形成，据衣纹变化形式大致可追索出由西而东的一条路线，即自犍陀罗到河西地区北凉石塔如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承玄元年（428）高善穆塔、承玄二年（429）田弘塔坐佛、炳灵寺169窟约420年前后的第7龕立佛，进而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太平真君四年（443）高阳蠡吾（今河北省博野县西南）菟申造像，



图二 金塔寺石窟菩萨、天王衣饰

1. 东窟中心柱右面下层左侧菩萨 2. 东窟中心柱右面下层右侧菩萨
3. 西窟中心柱右面下层右侧菩萨 4. 西窟中心柱右面中层思惟菩萨
5. 西窟中心柱后面下层右侧菩萨 6. 西窟中心柱左面下层左侧天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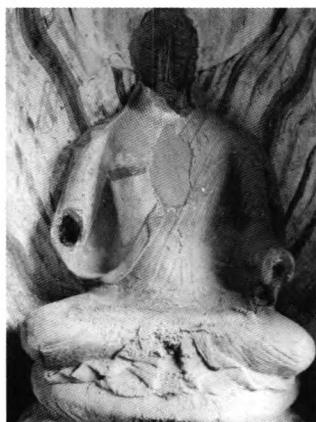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三 云冈石窟佛衣

1. 云冈20窟正壁佛衣及胸腹部衣纹 2. 云冈7窟主室正壁上龕左侧佛衣及右腿内侧衣纹



图版 1 东窟中心柱
正面下层龕佛



图版 2 西窟中心柱
右面下层龕佛



图版 3 东窟中心柱
右面中层中龕佛



图版 4 东窟中心柱
右面下层右侧菩萨



图版 5 西窟中心柱
后面下层右侧菩萨



图版 6 西窟中心柱
左面下层左侧天王



图版 7 西窟中心柱
右面中层思惟菩萨



图版 8 西窟中心柱
左面贴塑摩尼宝珠



图版 9 东窟龕楣尾
反顾龙头

及河北易县出土、现藏易县文管所和平六年(465)交脚菩萨像,最终在云冈石窟佛像服饰的勾连纹臻于成熟,又由云冈石窟直接或间接向外传播。^①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录了云冈石窟开始凿窟时的情况:和平初(460)“昙曜白帝,于京城西武州塞,凿山石壁,开窟五所,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,次六十尺,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”^②这最初的五窟即相当于今云冈石窟第16-20窟,五窟开凿的下限推断在献文帝末年(470)。^③继昙曜五窟之后开凿的洞窟有第7、8双窟及略晚的第9、10双窟等,^④推测第9、10双窟的开凿时间约始于太和八年(484),^⑤勾连纹饰在第9、10双窟中鲜见,^⑥可进一步推知第7、8双窟勾连纹的下限大致在太和八年(484)。云冈石窟基本不见胁侍菩萨装饰勾连纹。

据云冈石窟年代以及金塔寺佛、菩萨、天王普遍装饰勾连纹的情况,金塔寺佛像服饰的年代约可推定在太和(477-499)初期。

另外,东窟的勾连纹主要集中在主尊佛衣与胁侍菩萨衣上,西窟的勾连纹则较广泛,除主尊佛衣与胁侍菩萨衣外,主尊菩萨及天王衣上也有表现,并且胁侍菩萨还出现东窟未见的袒右式服饰,这一情况似表明西窟佛像服饰的年代较之东窟略晚。

三、金塔寺石窟的年代

关于金塔寺石窟的年代,主要有十六国和北魏两说。十六国说如属于十六国五凉时

① 陈悦新《云冈石窟佛像服饰的勾连纹》,中国考古学会、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庆祝宿白先生90华诞文集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12年,第272-292页。

②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114《释老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3037页。

③ 吉村怜《论云冈石窟编年》,吉村怜著,卞立强等译《天人诞生图研究——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》,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年,第256-274页,原载《国华》1140号,1990年;宿白《平城实力的集聚和“云冈模式”的形成与发展》,宿白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6年,第114-144页,原载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《中国石窟·云冈石窟》(一)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1年。

④ 宿白《云冈石窟分期试论》,宿白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,第76-78页,原刊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1期。长广敏雄《云冈石窟第9、10双窟的特征》,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《中国石窟·云冈石窟》(二)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4年,第193-207页。

⑤ 宿白《〈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〉校注——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》,宿白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,第60-61页,原刊《北京大学学报·人文科学》1956年第1期;宿白《〈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〉的发现与研究——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·哲学社会科学版》1982年第2期,第89-113页。

⑥ 第9、10窟壁面佛衣不见勾连纹纹饰,但两窟主室正壁佛衣为后代泥皮所覆,尚不宜遽言第9、10窟有此衣纹与否。

期(317-439),北凉时期的可能性最大;^①约在北凉后期;^②前凉或北凉时期均有开窟活动;^③约400年或以前。^④北魏说如太和及稍后的北魏时期(486-510);^⑤北魏460年代后半期以降;^⑥东窟的开凿年代约在五世纪50或60年代,西窟的开凿年代约在五世纪的70年代或稍晚。^⑦

本文据上述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分析,及云冈第7、8和第9、10双窟年代估定,姑认为金塔寺洞窟的营造年代大体与佛像服饰的年代相当,即金塔寺开凿时期约在太和(477-499)初年,其中东窟的年代略早于西窟。

另外,从题材内容、龕形装饰等方面也可看到金塔寺石窟与云冈第7、8和第9、10双窟间的相似之处。如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左面、右面和西窟中心柱后面中层主尊为交脚佛,西窟中心柱左面中层主尊为倚坐佛,西窟中心柱右面中层主尊为思惟菩萨(图版7)。云冈石窟交脚佛最早见于第7、8窟主室左右两侧壁的小龕内;倚坐佛、思惟菩萨最早见于第7窟主室正壁上方大龕,其布局为一交脚菩萨二倚坐佛二思惟菩萨,以及第8窟主室正壁上方大龕,其布局为一倚坐佛二交脚菩萨二思惟菩萨;第9窟主室的主尊为倚坐大佛。

又如金塔寺西窟中心柱左面、右面下层尖楣圆拱龕的尖楣正中贴塑有火焰光的六角摩尼宝珠(图版8),与云冈第7窟主室前壁圆拱门上方正中、第9窟主室窟门顶部的火焰光六角摩尼宝珠相似;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右面、后面、左面下层尖楣圆拱龕的圆拱的两端塑成反顾的龙头或忍冬图案(图版9),反顾的龙头见于云冈第7、8窟主室左、右、前三个壁面上的圆拱小龕的圆拱端部,以及第9、10窟主室前壁上层圆拱小龕的圆拱端部,忍冬图案在第7、8和第9、10双窟的小龕圆拱端部少见,但却是最常见的装饰图案。

① 详论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《马蹄寺、文殊山、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》(《文物》1965年第3期)、董玉祥《河西走廊马蹄寺、文殊山、昌马诸石窟群》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河西石窟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7年,第1-21页),更有文章指出金塔寺石窟即为北凉王沮渠蒙逊所开凿的凉州石窟,参见王洸《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》(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·石窟艺术编上》,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312-318页)、金维诺《中国古代佛雕——佛造像样式与风格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2年,第29页)。

② 宿白《凉州石窟遗迹与“凉州模式”》,宿白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,第39-51页,原刊《考古学报》1986年第4期。

③ Angela F. Howard, *Liang Patronage of Buddhist Art in the Gansu Corridor during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entral Asian Style*, 巫鸿主编《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0年,第262-263页。

④ Marilyn Martin Rhie, *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& Central Asia I*, Lieden Boston Koln: Brill, 2002, p. 388.

⑤ 张宝玺《河西北朝石窟编年》,敦煌研究院编《1994敦煌学国际讨论会文集——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(石窟考古卷)》,兰州:甘肃民族出版社,1990年,第259-260页;暨远志《张掖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》,《敦煌研究》1996年第4期,第22-35页。

⑥ 八木春生《河西石窟群年代考——兼论云冈石窟与河西石窟群的关系》,《美术史研究集刊》1997年第4期,第1-18页。

⑦ 李玉珉《金塔寺石窟考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总第22卷第2期,2004年,第44-45页。

河西地区极受北魏朝廷重视,镇守河西的人物多为北魏宗族或朝廷近臣。如北魏灭北凉后,太武帝即“留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,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”^①。太平真君十一年(450),张掖王秃发保周反,“征(尉)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”,其后又“诏眷留镇凉州,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,领护羌戎校尉。转敦煌镇将”^②。文成帝时(452-465)阳平王他出任“使持节、都督凉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”^③,献文帝和平六年(465)即位伊始,又“以淮南王他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,镇凉州”^④。孝文帝延兴元年(471),任“南安王桢为假节、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……,镇凉州”^⑤。太和九年(485)以前,^⑥文成帝婿长乐王秦州刺史、位列代北“勋臣八姓”之首的穆亮,“迁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敦煌镇都大将。政尚宽简,赈恤穷乏,被征还朝,百姓追思之”^⑦。卒于太和十一年(487)的南平王浑也曾任“凉州镇将、都督西戎诸军事、领护西域校尉……恩著凉土”^⑧等等。又据《魏书》记载,文成帝于太安二年(456)及和平元年(460)、三年(462)、五年(464)四度行幸河西,^⑨延兴三年(473),孝文帝也曾从太上皇献文帝行幸河西。^⑩

以上略可说明北魏国都平城与河西关系密切,金塔寺石窟的佛像服饰、题材内容、龕形装饰等内容表现出与云冈石窟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历史背景所致。

附记:2011年8月笔者收集资料期间,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给予鼎力支持与多方帮助。文中图版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魏文斌教授惠赐。在此一并致以诚挚感谢!

①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4《世祖纪》,第90页。

②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26《尉古真列传》,第657页。

③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16《道武七王列传》,第391页。

④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6《高祖纪》,第125页。据《魏书》卷16《道武七王列传》,阳平王他后改封临淮王、淮南王。(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,第391页)

⑤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7《高祖纪》,第135页。

⑥ 穆亮自敦煌被征还朝后,“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仇池镇将。时宕昌王梁弥机死,……弥机兄子弥承,戎民归乐,表请纳之。高祖从焉。”(《魏书》卷27《穆崇传附四世孙亮传》,第667页)“(太和)九年(485)……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其国王。”(《魏书》卷7《高祖纪上》,第155页),由此知,穆亮出镇敦煌在太和九年(485)以前。

⑦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27《穆崇列传》,第667页。

⑧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16《道武七王列传》,第400页。

⑨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5《高宗纪》,第115、119、120、122页。

⑩ [北齐]魏收《魏书》卷7《高祖纪》,第139页。